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6年11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宋珅 编辑:孙瑜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
E-mail:wyzk@tjrb.com.cn

雪岭长歌 山河为证

杨伯良



一

川西盘山公路如同一条灰色的丝带，沿着陡峭的山体盘旋而上，当海拔表指针接近3500米的时候，车窗外的绿色逐渐消失，最终融入亿万年前就已经凝固的苍黄色里。岷山上的雪被经年的寒风压实，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冷硬光芒，像刀刃上凝结了千年的霜。山谷中的风没有呼啸声，只在贴近地面时发出令人窒息的呜咽，好像在诉说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

少年时背诵“更喜岷山千里雪”，只觉得气势磅礴，是书页上可以读到的壮阔，却不知道这七个字包含着千钧重量。如今我就站在白雪绵延的岷山上，它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绵软感，只有坚硬的冰壳。每走一步，脚底都会打滑，必须用力跺下去，让鞋底扎进冰层才能站稳，抬腿的时候连半点积雪都带不起来，只有鞋底刮过冰壳时落下的碎屑，在日光下泛着冷冽的青光。

很难想象，九十年前，红军战士穿着破旧的单衣和草鞋，是如何迈出坚定步伐的。可以想见，当时红军用麻袋片搓成绳子编成的草鞋，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硬得像没有血肉的骨架，鞋底很薄，硬雪的棱角从缝隙中戳出来，狠狠硌着战士们已经溃烂的双脚。草鞋踩在冰雪上没有半点缓冲，混着麻缕的草鞋绳刚碰到锋利的冰刃，就会传来“咔”的轻响，那是冻得发脆的草纤维被冰棱割断的声音。鞋底没有防滑功能，就像一块被冰雪冻结的硬物，在冰面上摩擦时会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嘶嘶”声，像一根根细针扎进心里，在静谧的山谷里让人心头发颤。

九十年过去，岷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浸透着无数普通人的汗水和体温的一片土地。重读“更喜岷山千里雪”才能明白“尽开颜”三个字的分量：不是胜利之后喧闹的庆祝，而是耗尽了最后一丝体温的灵魂在绝境中挣扎时，发出的一声几乎听不到的颤音，轻得像雪落，却压住了所有的风声。

如今，在旅游手册上标出的“雪山留影”“云海奇观”等字样，只是宣传册铜版纸上令人充满遐想的介绍。九十年前浸透着苦难的绝望之路，已经被岁月的积雪无声抹去，时间会埋葬一切吗？风声不绝，岷山无语，只有巨石守护着所有的记忆。但我们不会忘记史书上波澜壮阔的战争，也不会忘记九十年前翻越岷山时倒下的先烈。

二

1935年9月，岷山的崇山峻岭之间出现了很多衣衫褴褛的人，他们并不是为了欣赏风景而来，而是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远征。腊子口位于岷山通道上，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峭壁，下面水流湍急，在两岸岩壁上修建的木桥是翻越岷山唯一的通道，守军在桥头、山崖等处设置了碉堡群，用一营兵力死守。红二师红四团先遣队9月16日下午发动五次进攻，都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击退，子弹击中崖壁，飞溅出灰白色的石屑。夜幕如同墨汁染透的画布一般沉重地压下来，黑暗中河水发出阵阵呜咽，四周寒意刺骨。

一名苗族战士，入伍时连名字都没有，人们只叫他“云贵川”。他是在西南大山里长大的，石壁和藤蔓都是他的玩伴，他能在几乎垂直的崖壁上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支点。红四团正面佯攻之时，年仅十七岁的“云贵川”摸到悬崖处，用野藤缠成杆子，用铁钩钩住峭壁缝隙，光脚攀爬，脚趾嵌入石缝。他像壁虎一样向上爬，崖壁上的碎石不断掉进深渊。他只靠脚趾和铁钩支撑身体全部的重量。“云贵川”登上山顶以后，把绑腿的一端系在树上，另一端垂下，战友们便沿着峭壁攀登，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敌人身后。

之后，红四团占领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红军入陕的通道，但没人知道“云贵川”后来去了哪里，“云贵川”这个绰号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记录。

翻越岷山的人有的十几岁，有的四五十岁，倒下的姿势有面朝北的，有蜷缩成一团的，有手握青稞面的。这些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人，如今已经化作了岷山的一部分，孕育着岷山上的青草和野花。

“三军过后尽开颜”不是惊天动地的狂喜，而是历经劫难之后的一种踏实的喜悦，在漫长的黑暗之后终于见到黎明时分的平静，就像沙漠中跋涉许久的人突然遇到一口井，既不敢相信又按捺不住地狂喜。

三

九十年后山河巨变，岷山已是旧貌换新颜。当年红军翻越的雪山草地，攻克的腊子口天险，那些曾经要以命相搏的关隘，并没有被岁月埋葬，只是换了一副模样，镌刻在这片大地的褶皱之中。

王朗自然保护区地处岷山山脉中部，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熊猫之乡”之称。

不到二十岁的罗春平，2001年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岷山腹地，行李中只有一双胶鞋，一件换洗的衣服，一个搪瓷缸子和母亲塞给他的几个煮熟的鸡蛋。

躲避盗猎者，采集大熊猫粪便，罗春平由血气方刚到步入中年，一直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左脚曾被断木桩刺穿，手术后留下了一道蜿蜒的伤疤，每到阴雨天都会隐隐作痛；他还和队友扛着几十斤重的仪器去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流石滩上安装红外相机，给大山装上眼睛，记录下整个岷山的秘密。

一起守护大山的还有梁春平，梁春平的父亲是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第一代巡护员，梁春平小时候经常跟父亲一同上山。

1997年，梁春平带着背包和母亲送的新胶鞋来到王朗，一待就是二十九年。他按照母亲教的方法自己缝补鞋帮，密密麻麻的针脚像一张微型地图，印在他走过的每一条山道上。鞋底磨穿了就在里面垫一层旧帆布继续穿，穿坏多少双鞋连他自己也记不清。

罗春平、梁春平等守山人，不知道九十年前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是从哪里走来的，但是他们用脚丈量过的每一寸山岭，都属于当年红军翻越过的岷山。同一座山，不同的人，前者为民族解放而战，后者为守护自然而生，在岷山看来，这是同一种姿态，把命交出去，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

四

离开王朗时，我捡起一块灰黑色的石头，它的表面看起来很普通，但当手指触碰到那条白色的纹路时，就会感到一丝微弱的温热传来，像是尚未停止的脉搏跳动。那一刻我才明白，长征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岷山也不是沉默的，它的褶皱里还保存着九十年来不曾消散的体温。

回头看岷山，我手里还握着那块岩石。风雪依旧存在，但那种刺骨的寒意已经变成了绵延不绝的历史气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在岷山，奋斗向前的脚步不曾停下，也不需要停下，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每走一步，“咯吱”的声响不再是雪层破碎的声音，而是九十年光阴作出的回答——无数先烈的英灵在雪层之下轻声低语：继续往前，不要停下……

一根红绳

于忠



1910年的夏季，赣南山区连降暴雨，雨势比往年都猛。吉安县长塘乡磨湾村的土坯房大多抵挡不住倾盆而下的大雨。山坳里的一家农户，就在四处漏雨的土坯房中迎来了一声响亮的啼哭。妻子在铺着干草的木板床上生下一个男孩，夫妻俩望着院外的雨，给他取名“大雨”。

大雨七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来，父母先后染病离世，只剩他和久病在床的奶奶相依为命。天不亮，他就要上山挖野菜，傍晚蹲在田埂边，等过路的农户施舍半块红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了下来。

一天，地主家的黄管家踹开柴门，把大雨拖到了地主家后院的牛棚。从此，这个还没牛槽高的孩子就成了小长工，每天天不亮就要挑满三缸水，踩着露水上山，放牛、拾柴，直到天黑透了，才能攥着管家扔给他的饽饽，一路小跑着回到家，和奶奶分着吃。

寒来暑往，奶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最终还是没能熬过那个飘着冷雨的秋夜。弥留之际，奶奶从枕套底下摸出一根在油灯下搓了半宿的红绳，用枯瘦的手指颤巍巍地缠在大雨的手腕上，绕了两圈，系了个结实的结：“戴着它，奶奶在天上也能护着你。”

从那之后，大雨一直戴着这根红绳，这一戴，就是十几年。红绳被泥水、汗水浸得褪成了淡粉色，边缘磨得发毛，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少年的手腕。连地主家的黄管家拽着他的胳膊打骂时，都没能把这根细细的红绳扯下来。大雨把奶奶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点念想，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1930年的风拂过赣南，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得像烧起来的火，把赣南的山冈染得通红。磨湾村的农会门前挂起了鲜艳的红旗，土墙上用白石灰刷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大字。

二十岁的大雨手腕上戴着红绳，站在征兵报名的桌子前，瞪大眼睛，攥着拳头，冲着登记的红军干部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当红军，替穷人打仗。”

干部抬头看着这个孩子，笑着问他的名字和生日。大雨挠了挠头，说只知道自己叫大雨，不知道生日是哪天。那天，大雨领到了一身粗布军装，他小心翼翼地把腕上戴了十几年的红绳解下来，系在军装的第二颗纽扣上。

大雨被分到红一军团通信连，成了一名通信兵。老班长把一台磨掉漆的电话机交到他手里，又拍了拍脚边的铁皮箱子，对他说：“这是咱们的命根子，人在，电话机在。”这句话被大雨刻进了心里。白天行军，他把铁皮箱子牢牢背在身后；夜里宿营，他就把箱子枕在头下睡觉，手始终攥着箱子的背带。从瑞金出发那天，他跟着队伍走过开满野花的田埂，鞋底沾着南方湿润的黑泥。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脚下这条飘着花香的路，会延伸成二万五千里血与火的征途。

1934年11月的湘江，风里全是呛人的硝烟味。三十万国民党军从三面合围，天上的飞机往下俯冲，炸弹在江面上炸开数丈高的水柱，碎木和碎石混着泥土砸在战士们的身上，连空气里都带着血腥味。大雨蹲在临时指挥所的土坑里，耳机里传来电流声。刚冲出门送信的通信员没走几步，就被一排子弹扫中，身体直直栽进了冰冷的泥水里。“快！把三团的线接上！”连长的嗓子都喊哑了。大雨抓起一卷电话线就往外冲，一块弹片擦着他的头飞过去，削掉了他头顶的八角帽，他低着头，猫着腰，顺着战壕往前跑，手上被弹片划开一道深深的血口子，终于在被炸断的树桩旁找到了电话线的两个断头。他把流血的手背在衣襟上蹭了蹭，咬着牙把露出来的铜芯一圈圈拧在一起，手疼得直哆嗦，几乎握不住那两根细细的电话线。

那天的湘江两岸，枪声从清晨一直响到深夜。大雨抱着电话机，听到耳机里不断传来阵地失守的消息，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有的手里还紧攥着没来得及扣动扳机的步枪，有的怀里还揣着未送出去的情报。他抬头往江边望，看见浑浊的江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水流推着遗体往下游漂，浪花拍在岸石上的声响，就像在低声呜咽。大雨把电话机护在怀里，一颗流弹从他肩膀旁擦过，“当”的一声砸在铁皮箱子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凹痕。

第五天傍晚，中央机关和大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湘江。此时，大雨身上的军装已经被血和泥水浸得硬邦邦的，像一身铠甲。他低头摸了摸怀里的电话机，耳机里清晰传来对岸的联络声，那一瞬间他感觉浑身没有了力气，一下子瘫倒在地，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后来的很多年里，他都不肯多提湘江战役的细节，只是偶尔用手抚过铁皮箱子上的弹痕，跟儿子低声念叨：“那天的水很深，味很腥，好多昨天还跟你笑着分干粮的战友，走着走着，就再也没影了。”

队伍往湘西走，后来又转进了云贵高原，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险。1935年6月，队伍走到夹金山脚下，当地老乡说这山连鸟儿都飞不过去，明明是6月，山顶上却飘着鹅毛大雪。大雨把仅有的两件单衣紧紧裹在身上，把电话机揣在怀里，跟着队伍一步一步往积雪没过膝盖的山顶爬。

山坳里刮出来的风裹着冰碴子，像锋利的小刀，割在脸上。走在他前面的老周，是从吉安一起出来的炊事员，背上那口行军锅的锅沿有个口子，那是过湘江的时候被弹片崩的。老周有严重的哮喘，每走一步都喘得厉害，却总爱回头冲大家笑，冻得发紫的嘴唇里露出两排不齐的牙：“等下了山，我给大家熬一锅热米粥。”

话音刚落，一阵狂风卷着雪沫子横扫过来，老周脚下一滑，整个人连着那口行军锅，顺着陡峭的雪坡直直坠了下去。大雨拼尽全力伸手去抓，却没有抓住。他趴在雪坡边往下望，全是白茫茫的雪，连老周的一点痕迹都看不见了。大雨跪在雪地里，撕心裂肺地喊着老周的名字，只有呼啸的山风卷着他的声音撞回来，被漫天的冰雪覆盖。大雨忽然看到纽扣上的红绳，在漫山的白雪里像一小簇没熄灭的火苗。他想起了奶奶，咬着牙从雪地里爬起来，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山顶挪去。

翻过夹金山，脚下的路变成了茫茫草地，草甸子一眼望不到头，脚下全是黑沉沉的沼泽。先头部队走过去，把能挖的草根、能摘的野菜都吃光了，大雨他们走在后面，干粮袋早就空了，连能找到的草根都寥寥无几。

连里有个小战士才十六岁，走不动路的时候就拽着大雨的背包带。那天他在沼泽边蹲了半天，突然蹦起来，手里攥着的树枝上叉着一条小鱼。“看，我抓到鱼了！”那小鱼才手指那么长，在树枝上扭动着。小战士把鱼递到大雨面前，露出虎牙，笑着说：“班长你吃，你要背电话机，得有力气。”

大雨把鱼塞回他手里：“你年纪小，得长身体，你吃。”

一天夜里，下着毛毛雨，大雨抱着铁皮箱蹲在一个潮湿的草墩上，听见远处传来微弱的呻吟，摸过去才发现是那个小战士，腿陷在沼泽里已经没了知觉。大雨解下自己的绑腿带，拼尽全力把人从泥里拉了上来。

那天夜里，他们相互依偎着，坐在湿冷的草地上，大雨把自己的半块干硬的饽饽塞给小战士，跟他说：“休息一会儿，咱们一起走，走出草地，就到陕北了。”

战士们连着几天吃野花、嚼草根，后来连皮带都解下来，用刀切成小块，放在铁皮缸子里煮，咬下去像啃树皮。

走出草地的时候，三十个从吉安一起出来的同乡，还剩下九个。后来南征北战，从陕北到平型关，从抗日战场到东北的黑土地，大雨一直背着那台电话机，从通信员到通信科长，铁皮箱一直跟着他。

1935年10月，陕北的风裹着黄土的暖香吹到脸上，大雨站在吴起镇的山头上，望着山下迎风飘起的红旗，感慨万千，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从赣南出发时漫山的映山红，到湘江里染红的浪涛，再到夹金山上的脚印，他背着这台沉甸甸的电话机，走了整整二万五千里。身边的战友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人名字刻在了沿途的岩石上，有的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只有这台带着弹痕的铁皮箱和这根红绳，从头到尾，都没离开过他。

后来大雨跟着队伍打过平型关的隘口，在太行山的窑洞里守着电话机熬过无数个不眠的深夜，又与战友们冲进平津战役的硝烟，直到1949年，看着满城飘扬的红旗，他才忽然反应过来，自己从家乡出发，已经走了二十个年头。

在组织的安排下，大雨在天津安了家，他把那台已经报废的电话机擦得干干净净，摆在堂屋柜子里最显眼的地方。他把那根红绳也缠回了手腕上。往后几十年里，他每天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一摸这根红绳，给儿子讲过去的故事，讲湘江的水，讲雪山上的风，讲那些没能走到陕北的战友。

后来儿子长大了，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临走前的晚上，大雨坐在灯下，把这根红绳又缠到了儿子的手腕上。他的手指已经有些颤抖，系绳结的时候，还是像当年奶奶那样，绕了两圈：“戴着它，就像我一直陪着你往前走。”

再后来，儿子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根红绳就一直跟着他。他像父亲当年那样，做事踏实，待人热忱，遇到困难时，手会不由自主地摸向那根红绳，想起父辈在炮火中咬着牙走完的艰苦岁月，浑身就又攒足了往前冲的干劲。

几十年过去，大雨的头发全白了，他总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望着南方。逢年过节，家里老少围坐在一起，他总会指着柜子上那台铁皮电话机，慢悠悠地讲起1930年，一个穿着粗布军装的青年，攥着拳头说要替穷人打仗的往事。

那根在油灯下搓出来的红绳，穿过二万五千里的硝烟，最后成了刻在这个家的印记，把先辈的牵挂、信仰和走过漫漫长路的勇气，一代又一代，稳稳地传递了下去。

大雨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丧事简办，骨灰盒上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那根磨得发亮的红绳，放在他军装的口袋里。后来，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那台掉了漆的旧电话机，箱子上的弹痕还清晰可见，透过那道凹痕，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耳机里嗞嗞的电流声，听见湘江边的枪声，听见雪山上飘来的风声。

伞下归途

王小欧



2019年，南开大学迎来百年校庆。那年我十三岁，随父母和扎着羊角辫的妹妹，自驾抵达天津。初夏的雨，细密，绵长，整座城市仿佛都湿透了。五大道人声鼎沸，撑着各色雨伞的游客挤满了窄巷。我厌倦了拥挤，便提议离开。父亲方向盘一打，将车子拐进了一条幽深的街道。回忆在风中转了一个弯，我们也随之进入了解放北路。

谁知这一拐，竟是命运的伏笔。

那时的解放北路很安静。法国梧桐的枝丫在空中交织，将天空切割成细碎的蓝灰色块。我下了车，撑开母亲送的折叠伞——黑色伞面，骨架很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使用它，此前它一直躺在我的书包侧袋里。雨丝斜扫过法国俱乐部旧址的屋顶，掠过那些老梧桐粗糙的树皮。我仰起头，看雨水顺着屋檐滴落。那一刻，我空落落的心好像有了依靠。我握紧伞柄，伞面替我挡住了雨滴，也替我圈出了一小片安心的天地。我分明是头一次来到这里，却熟悉得仿佛在梦里走过千百回。离开时，我慢慢地收起雨伞，指尖蹭到了冰凉的伞骨。我心里顿生遗憾，以后怕是很难再回到这里了。

2022年，阴差阳错，我又来到了天津。

这次是来读高中，学校在武清，远郊，没有五大道的人声鼎沸。那三年，是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宿舍的灯总是昏黄的，习题仿佛永远也刷不完。我很少去市里，解放北路遥远得像个旧梦，被我压在记忆深处，偶尔在上晚自习时冒出个重游的念头，立马又被铺天盖地的作业拽回了现实。

那把从老家带来的黑伞，淋过解放北路的雨后，一直躺在柜子深处，静悄悄的，陪我熬过了那些紧张的日子。

直到2025年高考结束，我颤抖着手点开录取查询页面，“南开大学”几个字赫然出现，我才终于有机会重回解放北路。

解放北路，从前叫维多利亚道，被称为“北方的华尔街”。哥特式的尖顶戳向云端，罗马柱上的凹槽，积着岁月的尘埃。雨水一冲，巴洛克山花更立体了。这些建筑沉默着立在道路两侧，看着我这个十八岁的青年踟蹰而过。

六年了，我重新撑开了那把黑伞，伞面依旧乌黑，只是边角掉了点漆，露着银白色的底，像宣纸上晕开的墨。雨打在伞上，闷闷的，一下一下，像心跳，更像是低语。我把伞压得很低，不看路人，就在这个伞底下的小世界里，回味着这六年的宿命感。原来2019年那次驻足，不是偶遇，是命运在多年前的那场雨里，给我预定的归途。

现在的路，比记忆里更加温柔。新开的店挨着法桐，落地窗里透出暖光。卖咖啡的年轻人，前一秒用流利的英文招呼外国游客，后一秒扭头用一口地道的天津话跟门口板凳上喝汽水的大爷唠嗑。新与旧的记忆交织在一起。那个曾被爸妈牵着逛街的山东小孩，怎么也不会想到，六年后的自己会撑着同一把伞，走在同一条路上。

走到路口，雨小了。我想起这六年里深夜刷题的焦灼，成绩起伏的失落，查到录取通知时的狂喜……所有没法说出口的情绪像潮水一般倒灌，如今又归于平静。

傍晚，雨停了。夕阳在云层的缝隙处露出金光。我缓缓地，一节一节收拢伞骨，直到“咔嗒”一声脆响。我转过身，身后的解放北路渐渐隐进薄雾。但它会一直在那儿，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远处的长椅上，两位白发老人正在闲聊，笑声缓缓传来。原来一座城的美好，不只在建筑，也不只在风景，更在于它承载的烟火日常。而我的故事，在这里刚刚开始。大学四年，我会带着这把伞，带着这六年的执念，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一开，我就会想起解放北路的那场雨。原来所有的“归来”，不过是因为从来不曾真正离开。

人生的路还长，你永远不知道拐角处会出现怎样的风景。而我知道，不管经历多大的风雨，只要撑开这把伞，我就拥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带给我重新出发的勇气，引领我走上归途。

伞痕已深，岁月还长。我收起伞，大步向前。

津门印记

老戏台的新唱本

卢朋佳



天空灰蒙蒙的，云层越积越厚，压得人喘不过气。阿成站在戏台上，心事重重。这座戏台有几百岁了，颜色早已褪去，但骨架还在，带着不肯倒下的倔强。

“最后一场了。”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阿成回头，看见师父老沈穿着一件旧戏服，从幕布后面走出来。这位曾经的昆曲名角，如今已是七十六岁，但身体还很硬朗。

“市剧团正式解散了。”师父把通知递了过来。

阿成低着头，没有接那张纸。他天资聪颖，六岁拜师，十岁便登台，二十二岁就获奖。他曾经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像师父一样，将昆曲发扬光大。

可如今，他却眼睁睁看着台下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少到最后一场演出只有七个观众。

“师父，我想把昆曲做进AI短剧里。”

老沈的手僵在半空：“什么？”

阿成转过身说：“我的朋友阿星在短视频公司做项目研发，可以将传统文化和短视频结合，通过AI做成一个系列，也就是短剧的形式。现在短剧是新潮流，很多人喜欢看，如果昆曲能在他们最熟悉的地方出现……”

老沈先是一愣，紧接着声音忽然拔高：“胡闹！”他涨红着脸，“昆曲是水磨调，一唱三叹，每一个音都有讲究，怎么能由着你瞎折腾？分明是糟蹋老祖宗的东西！”

“可是师父，老祖宗的东西要是没人听了，才是真正的糟蹋……”

老沈气得浑身发抖，坚决地摇头，“不行！不行！”

大雨忽至，雨声瞬时填满了戏台的每一个角落。

“你走吧。”老沈叹了口气，说，“我现在老了，什么也管不了了。”

阿成跪下，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戏台的木板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三个月后，他带着朋友阿星回来了。老沈和往常一样坐在竹椅上，喝着清茶，嘴里哼着《牡丹亭》——他第一次上台表演时的曲目，后来他曾凭借此曲夺得不少奖项。

阿成向老沈介绍阿星。阿星现在在一家短视频公司负责项目研发，策划的短视频很有人气，但随着AI技术的崛起，普通的短视频逐渐失去竞争优势，需要创新才能留住观众。阿星拿出包里的平板电脑，说：“沈老师，我们准备将昆曲中杜丽娘的故事改编成AI短剧，观众还可以自主选择支线剧情，自由探索其中的园林景观，不同的情境还能触发不同的唱段。”

阿星看老沈没说什么，便点开了演示片段。画面里，一座幽静的江南园林在晨雾中缓缓出现，太湖石、九曲桥、牡丹亭，每一个细节都还原到位。一个身穿戏服的AI杜丽娘在花丛中望向远处，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老沈有些吃惊，凑上前仔细查看：“这个杜丽娘的声调……”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她的步伐为什么……”

“每一个唱段都是阿成亲自录制的。”阿星解释道，“此外，我们给他穿了全套装备，通过AI动作捕捉技术把他所有的身段、眼神、手势录下来，再对人物框架、画面色彩逐一进行调整，这里面的杜丽娘走的是真正的台步，连兰花指都是标准的。”

一旁的阿成笑着说：“师父，要想昆曲有传承，得先让人了解嘛。”

“但是……人们会喜欢吗？”老沈眉头微蹙。

阿成坚定地说：“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试一试。”

一周后，以《游园惊梦》命名的AI短剧正式发布。发布前一晚，阿成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预想了很多种可能。

一大早，阿星打来电话。“今天视频发布，最开始观看人数只有几千，紧接着跳到了三万，然后是五万，现在已经是十万……你快看看！”

阿成忙点开评论区，观众们的讨论简直炸开了锅。

“这段皂罗袍好听到想哭！”

“原来昆曲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是很无聊的东西。”

“哪里有昆曲表演，我要去看！”

没过几天，阿成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昆曲博物馆打来的，说最近一周的参观人数比过去半年加起来还多。馆内负责人问阿成能否到现场进行演绎展示，他们会准备专门的场地。

刚挂掉电话，老沈就打了过来，声音难掩激动。“阿成，今天有好多人找到我，说要拜师学习昆曲……”

阿成鼻子一酸，“师父，短视频公司还要给短剧进行内容扩充，我想叫上您和师兄弟们共同演绎昆曲，融合进短剧，怎么样？”

“当然好！没想到我一把老骨头还能做短视频，用AI露露嗓！”老沈大笑起来。

阿成也笑了，他抬头望向天空，此刻晴空万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他脸上，温暖柔和。

远处的园林中隐约传来熟悉的曲调，“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是新的声音，新的唱法，但每一个字的韵脚，还是几百年前的模样。

小小说大观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三一〇一期